DOI:10.16565/j.cnki.1006-7744.2016.09.07

高校档案编研的成绩特点不足与建议

涂上飙

(武汉大学档案馆　武汉　450003)

摘　要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高等教育步入良性发展轨道。为了总结在办学过程中的经验教训,不少学校以档案资料的汇编为抓手,开展了丰富多彩的档案利用工作,也产出了众多的科研成果,取得了瞩目的成绩。但是,档案的编研利用工作无论从编研的数量还是质量来看,都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因此,档案的编研利用工作还需要进行新的探索。

关键词　高校档案编研　成绩　特点　建议　　**中图分类号**　G272　**文献标识码**　A　**收稿日期**　2016-03-16

Achievement, Deficiency, Characteristics and Suggestions About the Research of University Archives

Tu Shangbiao

(Wuhan University Archives, Wuhan 430072, China)

Abstract Higher education of China has steped into benign track after reform and opening up. To summarize the experience and lessons in the process of operating schools, through the compilation of archives, many schools has done lots of work on archive utilization. They produced many scientific research achievements and made a great achievement. However, There is still plenty of room for improvement about the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university archives whether from quantity or from quality . The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needs a new exploration.

Keyword Research and utilization of university archives; Performance; Characteristics; Suggestions

一、高校档案编研工作取得的成绩

全国高校三十多年的档案编研工作,公开出版的系列读物,对于宣传学校、促进学校发展,对于深化教学、促进科研,对于开展爱校教育、促进国魂的铸造等多个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1.成为助推高校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三十多年来,全国高校出版了不少以档案为基础编写的校史研究成果,但因时代的不同,又存在一定的差异性。20世纪80年代,出版了一批校史著作,但总体数量不多,规模不大,以建校历史较长且在全国高校中居于重要地位的大学为主。如《南开大学六十年1919—1979》、《北京大学校史1898—1949》《清华大学校史稿》《中山大学校史1924—1949》、《交通大学校史1896—1949年》等。

到90年代,修史的规模越来越大,学校也越来越多,又出版了一批著作。如《厦门大学校史(1921—1949)》《华中师范大学校史1903—1993》《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等。进入21世纪以后,出版校史著作无论规模、数量都大大超过了以前的总和。如《哈尔滨工业大学校史1920—2000》《山东大学百年史1901—2001》《南京大学百年史》《东北大学八十年》《吉林大学校史1946—2006》《安徽大学简史》《华中农业大学校史》《重庆大学校史1999—2009》《兰州大学校史》《中南民族大学校史1951—2011》等。上述档案编研成果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大部分与学校的校庆工作有关,基本上都是因校庆而作。上述著作出版的年份基本上都是学校十年大庆的时候。因此,完全可以说档案编研成为助推高校发展的一项重要工作。

2.为爱校教育提供了大量精神食粮。三十多年来,各学校在进行校史、校志编研的同时,结合所占有的档案资源,进行了大量的综合编研,大体涉及如下一些方面:(1)对过去的办学经历的回顾与总结。如《武汉大学西迁乐山七十周年纪念文集》《清华国学研究院史话》等。(2)对过去的学习、工作经历的回顾。如《清华工作50年》《同济生活六十年》《岁月如歌: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校友回忆录》等。(3)对大学的回眸、漫谈等。如《东陆回眸》《山大往事1902—1953》(山西)《武大逸事》等。(4)对学校革命历史的回顾与总结。如《战火中的大学:从陕北公学到人民大学的回顾》《日军铁蹄下的清华园》等。(5)对大学精神及文化的归纳总结。如《北大岁月:北大名流与北大精神》《清华精神九十年》等。这些编研的五个方面,从宏观到微观、从纵向到横向,由浅入深对学校的历史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为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对广大师生进行爱国爱校教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6)用图片说明历史。除了上述以文字为主体的综合编研外,不少高校还汇编出版了反映高校发展历史的图片史。如《北京大学图史》《南大影像》《武汉大学图史》《同济老照片》等。以原始档案为基础出版的图史,能更为直观地再现历史的原貌,给人以十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在对师生进行教育时必定会留下深刻的印象。

3.为教学科研提供了大量素材。20世纪80年代以来,不少学校以库存档案为基础,对档案进行了整理出版。80年代出版的有《南京大学校史资料选辑》《交通大学校史资料选编》《金陵大学史料集》等。90年代出版的有《厦门大学史料》《北京大学史料》《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等。进入21世纪以后出版的有《南大百年实录:南京大学史料选》《名人名师武汉大学演讲录》《邹鲁校长治校文集》、《云大文化史料选编》《抗战时期复旦大学校史史料选编》《清华大学历任校长演讲精选》等。上述所列校史出版资料,有历史长编,也有专题汇编。《北京大学史料》《清华大学史料选编》属于历史长编,它按时段对学校各个时期的制度、教学、管理、科研、教员、学生、图书仪器、经费、学生活动等进行了系统的整理归类。大部分的资料是属于专题性质的,有关于早期办学的,如川大关于鹿传麟的办学史料;有关于一段时期的办学史料的,如复旦关于抗战时期的办学史料;大部分是关于学校的教师、学生等方面的史料,如厦门大学、云南大学等均是。这些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为学校校史研究提供了丰富史料,也为高等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史的研究提供了更多的素材。

二、以校史为主体的档案编研的特点分析

1.编研的规范科学性日益明显。通过对三个时段出版的校史的取样,发现特色明显、亮点也很多。20世纪80年代出版的校史,从内容安排权重来看大体分为三类:一是带有综合的特征。即将学校的校史按沿革、制度、教学、科研、校长、学生活动、革命活动等时间的发展顺序进行内容取舍,大体平衡使用力量。二是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即校史中的革命活动、学生运动占了大部分的篇幅,具有革命史的特征。三是以突出业务为主。即全书中主要篇幅写教育制度、教学、科研、办学基础,尤其对教学和科研表述详实。20世纪90年代的研究,总体来看,语言表达更为朴实,对事实的表述脱离了较浓的政治氛围,史料十分丰富。如《西南联合大学校史》,全书由沿革、院系史、民主运动及课余生活和大事记组成。院系史是重点,占50%以上的篇幅。其他校史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对沿革、教学、学术、管理以及民主运动等进行了分类阐述,史料十分详实。21世纪的研究,总体来看,校史的撰写突破了原来政治氛围紧缩的框架,不仅史料丰富,语言活泼生动,而且内容涉及广泛、表现形式多样。除了撰写传统的沿革、教学、科研、革命活动外,还涉及大学文化、精神、理念,校史考证,校史的经验总结等方面的内容,表现手法更为灵活。不少校史校志,恰到好处地插入不少具有原始档案性质的图片,给人如临其境的印象。还出现了巨幅校史著作,如上海交大计划出版8卷本校史;四川大学已出版5卷本的校史;东北大学校志2册计200余万字;复旦百年志计300余万字;兰大校史约200万字。

2.专题研究亮点纷呈。高校在围绕学校发展,在重点编研的同时,还进行了分类研究。(1)对大学校长、大师的研究。对大学校长、大师的研究不少学校十分重视,分期分批开展了系列研究,出版了不少著作。如《蔡元培与北京大学》《蒋南翔传》《李国豪与同济大学》《人民科学家钱学森》《竺可桢》《王世杰传》等均是对大学校长、大师研究产出的一批成果的代表。(2)对大学文化的研究。这是近年不少大学兴起的一个新课题。围绕大学文化研究,已经出版了一批研究成果。如《海纳百川 有容乃大:北京大学文化研究》《世纪清华 人文日新:清华大学文化研究》《思源致远 百年神韵:上海交通大学文化研究》《流风甚美:武汉大学文化研究》等。(3)对大楼的研究。如《燕园建筑》、《武汉大学早期建筑》《钟灵毓秀:国立中山大学石牌校园》等。(4)对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如《继往开来——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90年》《武汉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史》《湖南大学研究生教育发展史》《民国时期的研究生教育发展史》等。(5)对学院史的研究。如《北京大学地质学系百年历程1909—2009》《上海交通大学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院史1913—2005》《复旦农学院史话》《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学科发展史》《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史》等。(6)对教会大学的研究。如《燕京大学史稿 1919—1952》《东吴大学》《金陵大学史》《江汉昙华林 华中大学》《相思华西坝 华西协合大学》《上海圣约翰大学1879-1952》《沪江大学史》等。(7)对有关史实的考证。如《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安徽大学校史溯源》《西安交通大学校址千年历史文化考》《薪传华章 浙江工业大学溯源》等。(8)对一些问题的深度研究。如《北大与清华 中国两所著名高等学府的历史与风格》《中国大学百年模式转换与文化冲突》《抗战烽火中的武汉大学》等。(9)口述历史。如《那时那人那些事儿——西南大学漫画96则》《上海交通大学校史研究口述系列——思源 往事》《华南理工大学文化建设丛书——岁月华园》等。(10)断代史研究。如《浙江大学在遵义》《乐山时期的武汉大学》《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等。这十个方面的研究,代表了大学校史研究发展的新趋向和今后的研究重点。对大学校长、大师的研究无疑是今后应该继续强化重视的;对大学文化的研究、大楼的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

研究、研究生教育的研究、学院史的研究、断代史研究都刚刚起步，发展前景十分广阔；口述历史是一项十分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当今显得十分必要，今后应该成为校史研究的重点之一。

三、研究的不足

1.服务本位的编研意识。多年来的档案利用编研，有一个主要的目的，那就是为学校决策、宣传服务，即服务本位的编研意识。服务本位是我们应该遵循的一项基本原则，但要把握好一定的度。目前的档案编研有一个不好的苗头，那就是一切以服务本位为出发点，其主要体现在：（1）从校史编研题材所占比重来看，过去的三十余年的校史编研，主要是以校史、校志的编研为主。从统计的1216项成果中可以看出：编写校史555项；编撰校志136项；史料整理90项；编写图史49项；专题研究73项；综合编研241项；教会大学38项；史实考证4项；深度研究29项。校史、校志的编研几乎占到整个编研的60%，而这些主要是按照学校领导的意志进行撰修的。因此，服务本位的意识十分明显。（2）从撰写内容安排权重来看，60%以上的校史存在厚今薄古的现象。厚今薄古是修史要遵循的一项原则，但也有如何把握的问题。有的校史近百年的时间，总共撰写有400多页，但对1949年以前的历史描述不过100页。显然，这样的撰写比例是有欠妥当的。

2.有待提高的编研质量。以档案为基础的校史编研，三十多年来产出了不少成果，但从质量上看还有待进一步提高。总体来看，编研存在两个方面的不足：一是编多研少。从统计材料来看，上述编研的各个方面，总体来看基本上是史料汇编，研究的东西不多。无论是回忆、回眸、故事，还是掠影、旧影、导读等都是史料的整理汇编。从汇编的情况来看，高质量的作品缺乏，而且缺乏源史料。二是缺乏深度。编研应该在史料的基础上，认真提炼，深度挖掘。但现在的不少出版物做得是不够的，对史料缺乏加工提炼。有的校史、校志将原始材料直接放入书中，让人不知是撰写校史还是资料汇编；有的史料非常丰富，但没有很好地整理归类，给人零乱、缺乏主次的感觉。

3.有待充实的编研成果。校史的编研在某种程度上说，是对档案资源的原始、初步和深度的开发利用，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对档案资料的整理汇编，包括专题资料和资料长编。这是对档案资源的原始利用。二是在资料汇编的基础上，进行基础性编研工作，如开展校史、校志的撰写等。这是对档案资源的初步开发利用。三是进行专题研究，如对校长大师、大学理念、教育制度、科学研究等的研究。这是对档案资源的深度开发利用。

应该说大学的校史编研为大学的决策、教学、科研以及文化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不少成绩，但还有进一步挖掘的潜力。从全国的编研成果来看，首先档案史料的发掘是不够的，且以专题和断代的史料为主，系统性的史料开发非常有限。从已经出版的史料来看，不少高校系统出版了不少史料，但从全国来看，有很多学校没有出版过史料。因此，档案资料的整理出版还有很大空间。其次建立在档案开发利用基础上的编研成果以史料的初加工为主，具有深度的成果不多。对于大学校长、大师的研究，各个时期的断代研究，教学制度、教学模式的研究，科学研究特点、成就的研究，大学精神、大学文化的研究等，无疑是应该加强的，也是校史研究长时期的一个重点。

四、工作的建议

1.要拓展编研工作的内涵。知识经济时代，校史研究工作应该主动适应信息化、国际化、现代化的需要，在校史研究的管理、服务、手段以及战略等方面都应该有一个大的转变。从编研内涵来说，应该从传统的服务决策为主的编研思路向服务大学功能建设、大学文化建设转变。因此，以后的校史编研可以进行如下拓展：（1）加强基础性开发。以《北京大学史料》《清华大学史料选编》为模式，系统地开展档案的整理和出版工作，或按内涵系统地出版史料。在多年的档案编研工作中，不少大学出版过档案史料，但都有言而不尽之嫌，缺乏系统。北大、清华出版的史料规模宏大、分类科学、气势雄伟。（2）加大特色性开发。结合规划、决策、教学、科研、育人等方面的需要，开展大学理念、大学制度、大师、大楼及办学模式的研究。

2.要努力提高人员的素质。校史编研成果的质量高低，在某种程度上与编研人员的素质有关。古人刘知几、章学诚、梁启超等对修史者提出了"史德、史识、史才、史学"四史"的要求，对今人仍有指导意义。编史修志的人员不仅要有甘于清贫、恪尽职守、乐于奉献的政治思想素质，更要有知识全面、技术过硬的业务素质。政治素质的提高主要靠政治理论的学习，靠严格的管理制度，靠公平有序的激励晋升制度。业务素质的提高主要靠专门的、业余的、结合工作的学习，学习教育学、历史学、档案学等方面的知识。

3.要探讨新的编研机制。要充分利用档案、校史研究会这一平台，开展协同性的研究。如就学校发展过程中的有关问题考证、学校的办学成就、办学经验的总结等展开研究；还可就学校发展过程中的某一方面进行深层次研究，如对其中的校长办学理念、学科建设的发展历史、人才培养的模式与特色、科学研究的特点与贡献、社会服务的方式与绩效、国际交流的源与流、教师评聘的经验、管理制度的继承与创新、文化育人的优与劣以及校园建设中的风与物等方面进行协同研究发掘。

★作者涂上飙为武汉大学档案馆馆长、博士，武汉大学历史学院副研究员、研究生指导教师。

?1994-2018 China Academic Journal Electronic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http://www.cnki.net